

媒體與社群：一個政治傳播學者眼中的脈絡

New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s: How a Political Scientist Comprehends the Concept of Context

劉正山 *

Liu, Frank C. S.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壹、「脈絡」的內涵

依據 Collins Cobuild 字典 (2007) 的定義，「脈絡」(context) 這個字範圍很廣，幾乎無所不包。所有與要探討的對象有關、對其會產生影響的所有因素都可稱作脈絡 (If something is seen in context or if it is put into context, it is considered together with all the factors that relate to it.)。從這個定義來看，無論是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都會處理到脈絡。這兩種科學都以解釋 (explain) 現象作為研究活動的重要目的。研究者除了尋找導致現象、事件或概念背後發生的因素之外，也可以探討這些因素如何影響所要探討的現象、事件或概念。因此，凡是能被稱作脈絡的現象或概念，一定要與被解釋的對象有經驗上、理論上、或是邏輯上的關係。

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除了解釋現象之外，還包括了描述 (describe)、預測 (predict) 及詮釋 (interpret) 等活動，並非所有的研究活動都強調使用脈絡這個概念。所謂描述型的研究指的是將經驗上或理論上的問題據實地勾畫出來；經驗上的問題例如地方派系的運作模式，理論上的問題例如政府規範市場失靈。預測型的研究依據概念模型對未來事件作出推導，例如推測集權政體的接班過程。詮釋型的研究則是從研究者本身出發、根據所收集到的資料為研究對象並賦與 (或重新賦與) 意義，例如亞洲各國如何理解崛起中的中國。描述型的研究比解釋型

* Email: csliau@mail.nsysu.edu.tw

的研究風格更加強調脈絡的重要性，因為這類研究往往是單一個案的研究或是以深度探討為出發點的研究，所以需要的就不只是找到與被研究對象直接相關的因素而已。好的個案研究往往也需要論及間接因素的影響¹。

預測與詮釋型的研究，相對於解釋與描述型的研究來說，比較不在意脈絡在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就預測型研究來說，預測根據的是個簡化過後的概念模型，而非依據全體脈絡。換言之，用來預測的模型都是從經驗或概念世界中篩選出來的變數（或稱變項，variables）所組成，因此脈絡在這類型的研究中扮演的是間接、輔助的角色²。至於詮釋型的研究，目的是「賦與意義」，因此有的會強調脈絡（例如「制度如何傷人」），有的則關注於討論概念本身（如「正義」、「自由」、「臺北國」等的意義）。

政治學門繽紛多彩，若從政治學者從事的活動來看，囊括了以上四種類型的研究，若從次領域來看，由於政治學的次學門眾多（依美國政治學會的資料，正式註冊的次學門或學群達 42 個；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11），學者在研究途徑的選擇上十分自由，政治學者對脈絡或解釋變數的理解或重要性認知不一，常出現學門內部次學門之間的辯論。次學門之間甚至會出現方法論上（methodology），乃至知識論上（epistemology）無法對話的窘境（Grant, 2005）。也就是說，如果我們隨意選兩位政治學者，他們對於脈絡的認知和強調的程度可能就截然不同。例如對於著眼於政府／國家／國際層次的政治學者而言，能夠影響菁英或國家決策的國內外環境、自身資源、政治制度、甚至是領導人的成長背景等都是脈絡的一部分；而對於著眼於組織、群眾、個人層次的政治學者來說，政黨認同、人際關係、家庭與學校、乃至個人的成長歷程等可能會是比制度更需要處理的脈絡。因此，對不同的政治學者而言，「脈絡是什麼」，仍然要端看他的研究對象而定。

-
1. 描述型的研究與以說故事為目標的新聞報導不同。新聞報導重視的是一個事件的歷史性與事實性的敘述，而描述型的研究除了說故事之外，仍然帶有為理論發展或釐清事件來龍去脈的目的。
 2. 預測型的研究與解釋型的研究兩者並不容易被二分，因為這些研究中的模型都是依據理論或邏輯所構成，這種模型既可以用於解釋，也可以用作推測。「這兩類型研究不是那麼重視脈絡」，並不是說脈絡變得不重要，而是說在這兩個類型的研究中，以簡馭繁（用簡化後的模型來解釋／預測繁複的社會／經濟／政治現象）才是研究者最在乎的事。在這個以簡馭繁的目的之下，脈絡將無法（也沒有必要）被完整的說出。

貳、一個政治傳播學者眼中的脈絡

「政治傳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是個跨政治學與傳播學,也同時得到兩個學門認可的研究領域³。政治學者與傳播學者同樣關注媒體與政治現象的關係,但兩者關注的主題並不完全相同:傳播學門裡的政治傳播學者著重的是媒體對政治過程的影響;而政治學門裡的傳播學者,則著重政治過程中的選民處理政治資訊的模式及這些資訊對他們偏好形成的影響。因此,除了研究對象不同之外,即使是在這個次學門裡,研究者對脈絡的理解仍然會隨著上述的研究目的(解釋、描述、預測或詮釋)而有所不同。以下僅從一個著重選民層次,以及以解釋現象為目的的研究者的角度來討論「脈絡」的意義。

一個選民的偏好形成,自身的政黨傾向或黨性(partisanship)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一個人的政黨傾向,無論外不外顯,都會影響他的議題立場以及政治行為(包括了投票投給誰、喜歡不喜歡執政者、對自己的政體有沒有信心等等)。近年政治學者的研究得到的結論是:政黨傾向是個解釋變數(explanatory variable),而會被其他變數影響的條件非常有限(Carsey & Layman, 2006)。換句話說,無論國內外,政治學者多從黨性及其強度的角度來研究選民行為。

這個自1970年代起盛行的密西根學派(Michigan School)的觀點,並非沒有遭遇到挑戰和修正。畢竟,要說黨性是解釋選民偏好形成的「唯一」變數(雖然大家都承認它是最重要的一個),很難令學者滿足。此外,不見得所有選民的黨性都是長時間保持穩定(雖然絕大多數人的確如此)。因此,在1990年後期政治學界引領了一股風潮,從「社群」角度出發,試著挑戰或修正密西根學派的觀點。這個研究系列在2000年後得到許多政治學者的關注。有趣的是,這股風潮並非源起自1990年末,準確的說是它是1940年代哥倫比亞學派(Columbia School)的復興(Zuckerman, 2005)。哥倫比亞學派強調選民的偏好,是受到他們最親近、最常互動的人所影響(Katz & Lazarsfeld, 1955; Lazarsfeld, Berelson, & Gaudet, 1944)。

這波哥倫比亞學派觀點的復興,雖無法取代密西根學派近乎鐵律式的結論(選民的黨性與黨性強度是最能解釋其政治行為的變數),但紮紮實實地提醒了沈醉於密西根學派成果的學者,在心理學的解釋變數之外,「環境變數」也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3. 更多資訊可參閱學門期刊或通訊:<http://www.politicalcommunication.org/newsletter.html> (Stroud, 2001)。

一個人獲取政治資訊的來源不外乎「社群」(social networks)與「媒體」(news media)。所謂的「社群」在這裡指的是跟自己常常談論政治或新聞事件的對象所形成的網絡(networks of political discussion)。政治學界的政治傳播學者近年來反覆確定了「人以群分」的道理，也就是選民尋找的政治或新聞談論的對象多是自己的親朋好友，而這些「自選」的談論政治對象跟自己的政治傾向多半相似(Roch, Scholz, & McGraw, 2000)。這樣的環境很可能會提高身處其中的政治意識、政治參與興趣，以及對不同意見的包容，並且會使自己的投票偏好跟社群中的其他人相近(Lin, Wu, & Lee, 2006; MacKuen & Brown, 1987)。這個從哥倫比亞學派觀點來解釋選民的偏好為什麼會偏向穩定的研究成果，可視為近年對密西根學派強調個人黨性強弱這個觀點最重要的補充。

早期的社群的研究著重於同質性社群的影響，而近期的研究則轉向著眼於異質性社群(heterogeneous network)的影響。社群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可以說是近十年來研究民意形成和政治行為的政治學者眼中最重要的解釋變數：一個選民的偏好與行為，與他的社群組成與互動頻率息息相關(Eveland & Hively, 2009; Rojas, 2008)。工作場所可以說是使一個人的社群產生異質性的重要脈絡，在工作場所接觸到的不同意見可以提高選民的政治知識(Mutz & Mondak, 2006)，不過網路社群之中，我們看到的反而是它們的同質性高過異質性(Wojcieszak & Mutz, 2007)。異質性社群影響了選民對政治事件的興趣(提高)、不同意見的包容力(提高)，以及投票偏好的穩定度(降低)(Basinger & Lavine, 2005; Kwak, Williams, Wang, & Lee, 2005; Lin et al., 2006; Liu, in press)。學界目前最沒有共識的一項議題是：異質性高的社群是否真的會造成民眾投票意願下降(Eveland & Hively, 2009; Jang, 2009; Mutz, 2002)。我們可以預見，這個針對異質性社群如何影響選民偏好與行為的研究與討論，將會再持續數年。

除了社群之外，「媒體」是選民的政治生活中另一個重要的政治資訊來源。筆者將媒體與社群並列為探討選民產生偏好或行為時必須要考量的脈絡，是因為這兩者加起來已經包含了所有我們可以找到、可以影響選民偏好與行為的資訊來源。政治學者所談的「媒體」並不只是傳播業者(例如某報社、某電視台、某頻道)或資訊傳播載具(如雜誌、廣播、網路)之外，還觸及了把訊息提供給傳播業者或被傳播業者播送的「資訊源」，亦即提供具有新聞性的訊息的政黨、機關、政府官員、政黨領袖、意見領袖，以及其他被傳播業者報導而具有話語權的人或機關。從這個角度看來，傳播業者自身也可能被包含在內(傳播業者常常是資訊的生產者而不只是傳播者)。因此，在政治學者眼中，選民政治生活的每一

天中，不太可能直接接觸到上述的這些資訊源，所以他們若不是被社群中流動的資訊所影響，就是被媒體傳遞的訊息所影響。當然，更常見的情形是兩者同時影響著選民。分析這兩者影響選民偏好與行為的差異、程度與機制便成了政治傳播這個領域十分具有挑戰性的任務⁴。我們可以想見，放眼所及的社會現象，或許都可以透過我們對於這兩者的了解，而得到解答。例如，媒體與社群是否出現極化（polarization）或對立現象，以及媒體或社群的極化現象對於社會整體的影響為何（Binder, Dalrymple, Brossard, & Scheufele, 2009; Liu, 2010），都可以是政治傳播學者責無旁貸的責任（這部分將會是屬於解釋型的研究）。當然，社會上許多其他現象（如媒體報導內容的淺碟化、民眾跟隨媒體新聞的從眾行為等）都是值得目前政治傳播學者進一步爬梳的主題（這部分將是屬於描述型的研究）。

參、脈絡與政治傳播研究

以上約略總結了一個政治傳播學者眼中脈絡的內涵，用經驗政治研究（empirical research on political phenomena）的語言來說，脈絡就是影響選民偏好與行為的外生解釋變數（external explanatory variables），亦即外於選民自身的資訊來源：社群與媒體。像是黨性（partisanship）或政黨認同（party identification）也是重要的解釋變數，且依定義，應要被視為是脈絡的一環。但是大多數政治學者並不視他們為「脈絡」，而是將它們視為內生解釋變數（endogenous variable）。政治學者認為這類解釋變數存在於民眾心智之內，所以它們扮演的角色與運作的機制，表面上並不像歷史、事件、制度、規範、社群、媒體那樣是「由外而內」產生影響力。

因此，若不看字典定義，筆者會毫不猶豫地說出脈絡就是社群與媒體。但若拉回「與要探討的對象有關、對其會產生影響的所有因素」都可稱作脈絡的話，政黨認同應該也可以被稱作脈絡。所以，「脈絡」一詞的模糊性恐怕會造成誤會（confusion）。筆者個人的建議是，我們用更多經驗研究學者聽得懂、比較不容易誤會的「解釋變數」一詞來指涉這些重要而相關的因素。

筆者個人並不熱衷使用「脈絡」二字。但無論是要用「脈絡」還是用「解釋變數」，更重要的，還是得回歸到「研究本身的目的為何」以及「怎麼把問題問

4. 有興趣的讀者可從 Zaller (1992)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ass opinion* 一書著手。它可視為這個領域解答這個問題最具原創性的作品。而「社群的存在是不是削弱了媒體對選民的影響」這個行之有數十年的辯論，最近也因為社群的研究再興而重新受到重視（Holbert, Garrett, & Gleason, 2010）。

對」這兩件事上。如果研究的目的是描述與解釋，那麼毫無疑問研究者必須把「什麼事情這麼值得研究」、「什麼是這個事情背後重要的因素」以及「這些因素在理論上或邏輯上如何影響這件事情」交待清楚。只要這些問題被恰當回答，「脈絡」便自然而然在其中被交待清楚了。

如果研究目的是詮釋或預測，研究者的注意力便會集中在「我們該怎麼理解這件事」或是「依照理論、邏輯、或是過往經驗，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這些問題上。這些研究的讀者便可以依據這些問題，來評估這些研究者是否妥善處理了應該處理的脈絡。

筆者發現，已經有愈來愈多跨領域的學者期望解釋型的研究不要只著眼在「抽象概念的推導」（理論層次）上，而是要把理論放回到經驗世界來取得有效性（validity）。在這個趨勢下，脈絡二字必然會在許多學術場合反覆被提起，甚至是被拿來作為批判一個研究不合格的工具。我期望這篇文章，把研究的不同目的揭示之後，學者及批評者可以更精細地去思考談論脈絡的必要性（在研究的世界裡，它很重要，但非全然必要），讓解釋型的學者在認識到脈絡的重要性之後，仍可以安於理論層面的發展和討論。

說得再更白一些，筆者認為與其強調脈絡二字的重要，甚至將它塑造成為理論型研究的緊箍咒，不如反過來鼓勵學者（尤其是已經強調脈絡二字的學者）問出能得到更多跨學門學者迴響的問題。依筆者粗淺的觀察，國內大多數研究是方法或資料趨動的研究（method/data-driven research），也就是研究者掌握了什麼途徑的觀點、立場或變數之後，就從頭到尾以它為出發點來問問題，並要求其他學者也要達到或考量這些觀點、立場或變數。這是我們未來需要謹慎避免的現象。

從一個政治傳播學者的眼中來看，也許社群和新聞媒體是所有做選民偏好與行為的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脈絡，但筆者並不期望也不贊成有人將它們強加成為其他研究領域「必須考慮」的變數。筆者的期望是，未來當有人問了一個好問題的時候，不同學門的學者可以貢獻出他們眼中「值得」的變數，供這位研究者來選擇。如果他已充分了解脈絡的意義和重要性，那麼即使他（決定）問的問題不需要考慮用脈絡來解答，我們應該要知道，那是不要緊的。

參考書目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11). APSA Organized Sections. Retrieved June 10, 2011, from http://www.apsanet.org/content_4596.cfm
- Basinger, S. J., & Lavine, H. (2005). Ambivalence, information, and electoral choic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9*, 169-184.
- Binder, A. R., Dalrymple, K. E., Brossard, D., & Scheufele, D. A. (2009). The soul of a polarized democracy testing theoretical linkages between talk and attitude extremity during the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6*, 315-340.
- Carsey, T. M., & Layman, G. C. (2006). Changing sides or changing minds?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policy preferences in the American electorat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0*, 464-477.
- Collins Cobuild Intermediate Dictionary of American English (2007). Boston, MA: Heinle ELT.
- Eveland, W. P., Jr., & Hively, M. H. (2009). Political discussion frequency, network size, and “heterogeneity” of discussion as predictors of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9*, 205-224.
- Grant, J. T. (2005). What divides us? The image and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38*, 379-386.
- Holbert, R. L., Garrett, R. K., & Gleason, L. S. (2010). A new era of minimal effects? A response to Bennett and Iyengar.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0*, 15-34.
- Jang, S.-J. (2009). Are diverse political networks always bad for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Indifference, alienation, and political disagreements.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37*, 879-898.
- Katz, E., & Lazarsfeld, P. F. (1955). *Personal influence: The part played by people in the flow of mass communicatio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Kwak, N., Williams, A. E., Wang, X., & Lee, H. (2005). Talking politics and engaging politics: An examination of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ructural features of political talk and discussion engagemen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2*, 87-111.

- Lazarsfeld, P. F., Berelson, B., & Gaudet, H. (1944). *The people's choice: How the voter makes up his mind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 New York: Duell, Sloan and Pearce.
- Liu, F. C. S. (in press). Perceived partisan heterogeneity in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changes in party choice in a national election: Evidence from Taiwa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2010). Polarized news media and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electorat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ificial Life Research*, 1(1), 35-50.
- Lin, T.-M., Wu, C.-E., & Lee, F.-Y. (2006). "Neighborhood"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aiwan: Spatial regression with disjoint neighborhood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59, 35-46.
- MacKuen, M., & Brown, C. (1987). Political context and attitude chang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1, 471-490.
- Mutz, D. C. (2002). The consequences of cross-cutting networks fo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6, 838-855.
- Mutz, D. C., & Mondak, J. J. (2006). The workplace as a context for cross-cutting political discours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8, 140-155.
- Roch, C. H., Scholz, J. T., & McGraw, K. M. (2000). Social networks and citizen response to legal 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4, 777-791.
- Rojas, H. (2008). Strategy versus understanding: How orientations towards political conversation influence political engagemen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5, 452-480.
- Stroud, N. J. (2011, June). Welcome. *Th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port*, 21(2). Retrieved July 1, 2011, from <http://www.politicalcommunication.org/newsletter.html>
- Wojcieszak, M. E., & Mutz, D. C. (2007, June). Online groups and political deliberation: Does the internet facilitate exposure to political disagree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TBA, San Francisco, CA.
- Zaller, J. (1992).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ass opin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uckerman, A. S. (Ed.). (2005). *The social logic of politics: Personal networks as contexts for political behavior*.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